

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生漆制造漆器的国家之一。漆器的考古发现，始于20世纪20、30年代，至今已经历经100的历程，与之相关的研究伴随着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积累亦不断发展。总体而言，古代漆器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初始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

20世纪20—40年代，在湖南长沙地区因盗墓等原因陆续发现数量较多的战国西汉漆器。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发掘时，于M1001中清理出包括豆在内的数件保存较好的商代晚期漆器，这是中国境内较早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漆器，但相关考古资料的发表时间较晚。^[1]除中国境内的发现外，20世纪20年代，在今朝鲜平壤（汉代属乐浪郡）汉墓中出土一批保存较好的汉代漆器，其中许多为有铭漆器。^[2]得益于这些材料的出土，学者开始注意到漆器这个古代器物中重要的门类。以容庚为代表的学者，对朝鲜平壤等地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进行了集中考释。^[3]郑师许根据传世文献，结合出土实

[1] 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2] [日]关野贞等：《乐浪郡時代の遺蹟》，朝鲜总督府，1927年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乐浪——五官掾王盱の墳墓》，刀江书院，1930年版；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篋冢》，京都便利堂，1934年版；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王光墓》，桑名文星堂，1935年版。[日]藤田亮策、小场恒吉：《乐浪汉墓》第一册，乐浪汉墓刊行会，1974年版。

[3] 容庚：《乐浪遗迹出土之漆器铭文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26年，第39—42页。

物，对汉代漆器，特别是夹纆胎漆器进行了初步研究。^{〔1〕} 商承祚收集整理了长沙地区墓葬出土的部分漆器，编写了《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书中对一些漆器的定名进行了考释，并重点突出了对纹样的描绘，此书是有关战国秦汉漆器总结研究的最早尝试。^{〔2〕} 此外，日本学者也对朝鲜平壤出土的中国汉代漆器进行了整理研究，其中既有对有铭漆器的铭文释读，^{〔3〕} 也包括对特殊漆器纹样内涵意义的考据。^{〔4〕}

总体而言，此阶段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漆器材料数量较有限，有关漆器的研究，涉及的方面较少，漆器研究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 过渡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随着国内正式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此时期漆器的出土数量与出土地域较前一阶段都有所增加，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遗址出土有商、西周漆器残片，^{〔5〕} 而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以及湖北江陵等地，都有数量较多的战国秦汉漆器出土。^{〔6〕} 其中湖南长沙地区发掘的千余座楚墓中，出土较多的漆器，是湖南战国漆器最主要的发现，但部分材料直至 21 世纪才整理公布。^{〔7〕} 学者们根据新出土发表的考古材料，对战国秦汉漆器进行了更多方面的研究，但主要仍限于对出土漆器的介绍^{〔8〕}以及漆器图案研究^{〔9〕}，少数涉及美术考古的范畴。^{〔10〕} 此阶段，出现了有关汉

〔1〕 郑师许：《漆器考》，中华书局 1936 年版。

〔2〕 商承祚：《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 年版。将此著录归入漆器考古与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原因是本书收录的漆器，主要为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初作者收集的漆器资料，基本无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标本，在资料来源方面，更具备第一阶段的特征。

〔3〕 [日] 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桑名文星堂，1944 年版。

〔4〕 [日] 原田淑人著，姚薇元译：《乐浪出土之画像漆器》，《清华周刊》1930 年第 33 卷第 7 期。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 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蕲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 年第 1 期。

〔6〕 孙作云：《我国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信阳楚墓介绍——兼论大“镇墓兽”及其他》，《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7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江陵出土虎座鸟架鼓两座楚墓的清理简报》，《文物》1966 年第 5 期；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 年第 5 期。

〔7〕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

〔8〕 吴铭生：《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7 期；苏北治淮文物工作组：《扬州凤凰河汉代木椁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7 期。

〔9〕 徐则林：《试谈长沙出土战国漆器工艺图案》，《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7 期。

〔10〕 杨宗荣：《战国漆器花纹与战国绘画》，《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7 期。

代漆器的综合性研究,在陈直所撰《两汉纺织漆器手工业》一文,以及商承祚所撰《我国古漆器与广州出土汉代漆器初探》一文中,涵盖了漆器的制作工艺、铭文、纹饰图案、生产地区和部门等多方面内容,但论述都相对简略。^[1]

三 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

此时期,各地出土漆器数量倍增,几乎每年都有新材料发表,相应研究也不断推进,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较以往大大发展。

(一) 考古发现

先秦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至夏商西周时期的漆器发现较以往有所增加,丰富了学界以往对东周以前漆器的认识。新石器时代的漆器,主要发现有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2]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朱漆瓜棱碗和缠藤篾朱漆筒形器,^[3]良渚文化各遗址中出土的嵌玉漆器、漆觚等器物,^[4]浙江遂昌好川墓地出土的漆觚,^[5]以及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的觚、豆、案、俎等漆器。^[6]其中,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髹漆木弓,将中国利用生漆制作漆器的历史提前到至今约8000年。

夏时期的漆器发现相对较少,主要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觚、钵等,^[7]时代

[1] 陈直:《两汉纺织漆器手工业》,《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商承祚:《我国古漆器与广州出土汉代漆器初探》,《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3]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卞家山》,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家山》,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南京博物院、江阴博物馆:《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庐博物馆:《浙江桐庐小青龙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1期。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与二里头文化大致相当的内蒙敖汉旗大甸子遗址也出土有两件近似觚形的漆器。^[1]

商代漆器则发现稍多，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2]、罗山天湖墓地^[3]、河北藁城台西遗址^[4]、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5]、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墓地^[6]等地点，都有漆器的发现，主要器类有盘、盒、壶、豆等。

西周漆器的发现与前代相比，大大丰富，基本在王畿之地和主要诸侯国都有发现，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批漆器材料，见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7]、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8]、宝鸡周原遗址^[9]、宝鸡強国墓地^[10]、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11]、洛阳北窑西周墓地^[12]、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13]，主要器类有豆、盘、簋、盒、杯、俎、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2004—2008年殷墟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6]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3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M183西周洞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张家坡M170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9] 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周原遗址庄李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2期；周原考古队：《1999年度周原遗址I A1区及IV A1区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538页。

[10]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強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大河口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1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2013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觚、壘、壶、彝、禁等。

春秋时期的漆器，发现也相对较多，其中较重要的发现地点有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墓^[1]、海阳嘴子前墓地^[2]、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3]、莒南大店子一号殉人墓^[4]，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5]、长子县东周墓^[6]、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7]，湖北当阳赵巷四号墓^[8]等，器类也较为丰富。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发现数量剧增。战国漆器的发现，主要集中于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等省份。湖北地区有漆器出土的地点非常多，其中较重要的地点包括随州曾侯乙墓^[9]、江陵雨台山墓地^[10]、九店墓地^[11]、望山沙塚墓地^[12]、望山桥 M1^[13]、天星观 M1 与 M2^[14]、荆门包山楚墓 M2^[15]、马山 M1^[16]，枣阳九连墩 M1 与 M2^[17]、云梦睡虎地秦墓^[18]等等。湖南地区重要的漆器发现地点主要包括长沙浏城桥

[1] 山东省博物馆等：《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2] 烟台市博物馆、海阳市博物馆：《海阳嘴子前》，齐鲁书社2002年版。

[3]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管站：《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

[4] 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5]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院：《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7]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8] 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当阳赵巷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赵巷楚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

[9]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0]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13]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2期。

[14]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15]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6]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文物考古队：《湖北枣阳九连墩 M1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文物考古队：《湖北枣阳九连墩 M2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第6期。

[18]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湖北省博物馆：《1978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M1^[1]、临澧九里楚墓^[2]、常德德山楚墓^[3]等，河南地区发现的战国漆器，集中在河南南部的驻马店、信阳地区，主要地点包括信阳长台关 M7^[4]，新蔡葛陵楚墓 M1^[5]，此外泌阳也出土有战国晚期漆器。^[6] 四川地区重要的漆器发现地点主要包括成都商业街船棺墓^[7]、荣经古城坪墓地^[8]、曾家沟墓地^[9]、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地^[10]等。此外，保存较好的战国漆器还偶见于安徽、辽宁、浙江、江苏等地区，主要发现地点包括安徽舒城秦家桥楚墓^[11]、潜山彭岭楚墓^[12]、宣州西林楚墓^[13]，浙江安吉五福 M1^[14]，江苏扬州西湖镇果园战国墓^[15]等。

秦汉时期漆器的发现则更加丰富，漆器出土地域也进一步扩大，除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台湾、天津、上海外，基本全国范围都有漆器出土。其中漆器数量较多、保存状况较好的地点主要包括：湖北江陵凤凰山墓地^[16]、荆州高台秦汉墓

[1]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 湖南省博物馆，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临澧九里楚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3辑，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7—111页。

[3]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9期。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6] 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第9期。

[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8] 荣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荣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4页。

[9] 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化馆，荣经县文化馆：《四川荣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10]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11] 舒城县文物管理所：《舒城县秦家桥战国楚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35—146页。

[1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潜山彭岭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13] 宣州市博物馆：《宣州市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12辑，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75—76页。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五福楚墓》，《文物》2007年第7期。

[15] 扬州博物馆：《江苏扬州市西湖镇果园战国墓的清理》，《考古》2002年第11期。

[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地^[1]，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地^[2]，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长沙国王陵区墓葬^[4]，沅陵虎溪山 M1^[5]，永州鹞子岭 M2^[6]，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及其陪葬墓^[7]，扬州仪征汉墓^[8]、邗江胡场汉墓^[9]、甘泉乡汉墓^[10]，山东临沂金雀山、银雀山汉墓^[11]，

[1]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 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 年第 1 期；湖北省博物馆：《1978 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 年第 4 期。

[3]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4]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轡墓》，《文物》1979 年第 3 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 年第 1 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12 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 年第 4 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12·29”古墓葬被盜案移交文物报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六辑，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329—368 页；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岳麓书社 2016 年版。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1 期。

[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 年第 4 期。

[7]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 年第 10 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1 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 M9、M10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 年第 1 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墓》，《考古》2014 年第 3 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东区陪葬墓》，《考古》2013 年第 10 期；南京博物院、盱眙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 1 号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20 年版。

[8] 南京博物院、仪征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 年第 4 期。仪征市博物馆：《江苏仪征刘集联营 1—4 号西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7 年第 8 期。

[9]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文化馆：《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1980 年第 3 期；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 年第 11 期。

[10] 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 年第 11 期；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 101 号汉墓》，《文物》1988 年第 2 期。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 102 号汉墓》，《考古》2000 年第 4 期。

[11] 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11 期；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1 期；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 年第 1 期；金雀山考古发掘队：《临沂金雀山 1997 年发现的四座西汉墓》，《文物》1998 年第 12 期；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1975 年第 11 期；银雀山考古发掘队：《山东临沂市银雀山的七座西汉墓》，《考古》1999 年第 5 期；银雀山汉墓发掘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11 期。

青岛墩式封土墓^[1]，日照海曲、大古城汉墓^[2]，安徽巢湖汉墓^[3]，阜阳双古堆汉墓^[4]，江西南昌海昏侯墓^[5]，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6]，绵阳双包山汉墓^[7]，荣经汉墓^[8]等。

（二）研究与探索

伴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先秦两汉漆器的研究工作亦不断推进。由于考古发现的逐渐增多，学者们开始较多关注新石器时代及商、西周时期的漆器，这也成为此阶段漆器研究的特点之一。1980年代，高炜以陶寺遗址出土彩绘漆木器为主要材料，总结了陶寺遗址漆木器的形制、功能和制作工艺，并指出其与商周时期同类漆器之间具有源流关系。^[9]殷玮璋根据北京琉璃河遗址等地出土的西周漆器，初步讨论了西周时期漆礼器的存在，以及西周时期漆器与青铜器纹样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某些青铜礼器可能是模仿漆器而来，此外还讨论了商周漆器制作中的镶嵌技术。^[10]王巍则整理了当时所见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漆器材料，并集中讨论了西

[1]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考古》2017年第10期；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琅琊墩式封土墓》，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期；日照市博物馆：《山东日照市大古城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4]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器》，《文物》2018年第11期。

[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年第7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2016年第1期。

[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博物馆、荣经县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县高山庙西汉墓群M3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博物馆、荣经县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县高山庙西汉墓群M5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6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博物馆、荣经县博物馆：《荣经高山庙西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

[9] 高炜：《陶寺龙山文化木器的初步研究——兼论北方漆器起源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二辑）——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6页。

[10] 殷玮璋：《记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漆器》，《考古》1984年第5期。

周时期漆器的制作工艺、功能，以及漆器与青铜器的组合关系等问题。^{〔1〕}

进入 21 世纪以来，得益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现与公布，有关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漆器的讨论更加丰富。赵晔撰文总结了良渚文化时期漆木器的发现，并指出其中部分精致漆器应具有礼器的功能。^{〔2〕} 方向明、严志斌等分别撰文，梳理了新石器时代及夏文化时期，漆觚和其配套构件的发现，并从功能角度讨论其与柄形器的关系。^{〔3〕} 卢一通过对先秦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漆器形制、组合与出土背景的研究，梳理了先秦漆礼器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其发展历程与先秦礼制社会形成与衰落的关系。^{〔4〕}

此阶段漆器研究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战国秦汉漆器研究的极大丰富与发展，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漆器类型学与分期研究

1980 年，陈振裕发表《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一文，文中首先对战国秦汉时期 12 类漆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再选择 12 种漆器纹样进行类型学分析，分别总结出器物形制的基本组合和漆器纹样的基本组合，并将其对应墓葬年代，最终将战国秦汉时期漆器分为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汉早期、西汉武帝时期共五期。^{〔5〕} 虽然此文发表时间很早，但后来有关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大抵都遵循了此文建立的基本年代框架。更为重要的是，文中除对漆器器形进行类型学梳理外，还将漆器纹样的类型学变化纳入分析，从而更准确把握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特征，该文也成为关于漆器类型学与分期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洪石在《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中，将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 14 种漆器进行分型定式，结合共存关系，将它们分为十三组六期，并根据六期对应的墓葬年代将六期的年代定为战国早期偏晚、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和东汉。^{〔6〕} 聂菲在《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中，根据湖南地区东周至西汉时期出土漆木器的墓葬年代，将湖南地区春秋中期至西汉晚期楚汉墓中出土的漆器，分为六期十段，六期年代分别为春秋中期后段至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西汉

〔1〕 王巍：《关于西周漆器的几个问题》，《考古》1987 年第 8 期。

〔2〕 赵晔：《初论良渚文化木质遗存》，《南方文物》2012 年第 4 期。

〔3〕 方向明：《好川和良渚文化的漆觚、棍状物及玉锥形器》，《华夏文明》2018 年第 3 期；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 年第 1 期。

〔4〕 卢一：《论先秦礼器中的漆器传统》，《古代文明》第 1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8—56 页。

〔5〕 陈振裕：《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江汉考古》1980 年第 2 期。

〔6〕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112 页。

早期、西汉中晚期。^{〔1〕}近年，卢一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研究》中，对战国秦汉时期 11 种漆器进行类型学排比，并着重分析了漆器纹样的类型学变化，结合器型与纹样两方面的特征，对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重新进行了分期，对汉代特别是西汉早期以后的漆器做了更细致全面的分期。^{〔2〕}

与漆器类型学及分期的综合研究相比，关于单类器物的类型学研究数量很多，但总体而言，涉及考古类型学分析，特别是“式别”的梳理，即器物历时性变化的研究较少。^{〔3〕}不过，近些年，一些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开始对单类漆器进行跨时段分析，通过分型定式来考察不同时代器物形制的变化。^{〔4〕}

2. 漆器分区研究

漆器分区研究主要指对一个区域内出土漆器的综合研究，同时也包括对一定时期广地域范围内漆器的分区研究。自 1980 年代起至今，学者陆续讨论了两湖、江南、巴蜀、安徽等地区出土的漆器器类、制作工艺、纹样风格特征，以及漆器生产管理方式等问题。^{〔5〕}陈振裕在《我国东周漆器的分区初探》一文中，将东周漆器分为齐鲁、三晋、秦和楚四个区，并总结了四个区域内漆器制作、造型、装饰工艺与纹样的异同，探讨了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此文有关广地域范围内漆器分区研究的代表之一。^{〔6〕}此外，李昭和等学者，尝试将战国时期秦国与楚国、巴蜀与楚国的漆器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战国时期漆器分区研究的尝试。^{〔7〕}

〔1〕 聂菲：《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岳麓书社 2013 年版，第 294—381 页。

〔2〕 卢一：《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 2020 年博士学位论文。

〔3〕 聂菲：《楚系墓葬出土漆豆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楚文化研究论集》（六），荆楚书社 2006 年版，第 108—120 页。

〔4〕 刘芳芳：《战国秦汉妆奁研究》，南京大学 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王哲：《战国至西汉漆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

〔5〕 陈绍棣：《战国楚漆器述略》，《中原文物》1986 年第 1 期；后德俊：《试论楚国漆器及其制造技术》，《楚文化研究论集》（一），荆楚书社 1987 年版，第 184—194 页；周刚：《汉代江南漆器制造业》，《南方文物》1996 年第 3 期；李昭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髹漆工艺》，《四川文物》2004 年第 4 期；张茹霞：《安徽楚墓出土漆木器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安徽大学 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

〔6〕 陈振裕：《我国东周漆器的分区初探》，《楚文化研究论集》（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4—227 页。

〔7〕 李昭和：《巴蜀与楚漆器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3—99 页；院文清：《楚与秦汉漆器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87 年第 1 期；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文博》1990 年第 5 期；朱学文：《秦楚漆器比较研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贰辑，2012 年。

3. 名物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名物研究，主要是镇墓兽、漆面罩、虎座飞鸟等形制特殊的器物名称的考释。如高崇文通过梳理墓葬中镇墓兽的形制、出土背景，以及传世文献中“重”在丧葬中的使用场景，认为镇墓兽在墓葬中的用法与“重”有许多相似之处，并结合铜器铭文，将镇墓兽定名为“祖重”。^[1] 对战国秦汉时期日用漆器的名称考释，则可以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相关章节为代表，书中将漆器器型、漆器铭文与墓葬中同出的“物疏简”相对照，对漆器重新定名，如将耳杯、羽觞统一定名为“杯”，圆盒定名为“盛”、耳杯盒定名为“具器”等。^[2]

4. 漆器制作工艺研究

对制作工艺的研究，是目前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中数量较多，研究也相对最为成熟的一类，学界对各个时期漆器制作工艺的类型与特点也已基本达成共识：战国秦汉时期，是漆器制作工艺大发展的时期，与此前相比，漆器的胎骨除木、竹、原始瓷、铜胎外，新增了夹纻胎、布胎这两类重要的胎骨类型；髹饰工艺方面，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髹饰工艺大大发展，包括雕刻、漆绘、油彩、锥画、堆漆、填漆、戗金和描金银等多种工艺。对漆器工艺的讨论，还包括对一些特定工艺的讨论。如傅举有根据考古出土汉代锥画漆器材料，总结了锥画工艺与戗金工艺的诞生时间、装饰手法以及纹样题材等。^[3]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及其在考古领域的应用，使用多种现代检测手段，对漆器、漆膜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漆器制作工艺的研究逐渐增多。显微切片观察、X 光投射技术、拉曼光谱（RAMAN）、傅立叶红外光谱（FTIR）、固态核磁共振光谱（CP/MAS-NMR）、扫描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XRD）、X 射线荧光光谱（XRF）等科技分析手段，可以进一步帮助了解漆器胎体与灰层的制作工艺、漆液加工工艺、髹漆过程、色漆颜料成分等制作工艺的细节。^[4]

[1] 高崇文：《楚镇墓兽为“祖重”解》，《文物》2008 年第 9 期。

[2]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86 页。

[3] 傅举有：《中国古代漆器的锥画艺术和戗金艺术》，《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4 期。

[4] 金普军、赵树中、唐光孝：《绵阳双包山出土汉代漆器概谈》，《四川文化》2004 年第 2 期；金普军：《汉代髹漆工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金普军、谢元安、李乃胜：《盱眙东汉墓两件木胎漆器髹漆工艺探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 年第 3 期；孙红艳、江勤、余珍珠：《湖南长沙风篷岭汉墓漆器漆膜测试分析与髹漆工艺研究》，《江汉考古》2014 年第 S1 期；王子尧、王冰、张杨、靳祎庆、杨晖、吴玥：《扬州“妾莫书”墓出土漆耳杯制造工艺研究及扬州汉代漆器“工官”的思考》，《江汉考古》2019 年第 S1 期。

5. 漆器纹样研究

对漆器纹样的研究，除简单对纹样进行概括性描述和题材分类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纹样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前文提及的陈振裕撰《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中纹样分析的部分。卢一将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纹样重新进行类型学梳理，将纹样分为主体纹样与附属纹样两类，并对 18 种主体纹样和 23 种附属纹样进行了细致的型式分析，为漆器的分期年代研究等提供了基础，是近年有关漆器纹样研究的新进展。^{〔1〕} 第二，纹样风格的研究，主要是对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纹样风格演变的研究。如陈丽华通过分析湖北出土战国西汉时期漆器纹样题材的异同，认为湖北地区的漆器纹样风格，经历了从楚国时期巫术色彩浓厚的神秘、浪漫的风格到西汉较为写实的纹样风格的转变。^{〔2〕} 第三，漆器纹样与其他材质器物纹样的关系研究，即讨论此时期漆器纹样与丝织品、青铜器、铜镜纹样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借鉴的关系。^{〔3〕}

6. 铭文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有铭漆器的材料大大增加，对漆器铭文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涉及漆器制作工艺工序的特殊铭文的考释，以及对漆器铭文内容的分类分析。“泆”，是汉代漆器上较常见的表示漆器某一制作工序步骤的铭文，对此字的释读长期以来存在分歧。^{〔4〕} 洪石、任攀等学者，根据对“泆”铭漆器的形制特征、“物疏简”记录以及相关铜器铭文的综合考察，确定了此字应释为“泆”，意思是为漆器髹涂红漆，基本解决了这一争议问题。^{〔5〕} 对漆器铭文内容进行分类分析的研究，多为针对某一

〔1〕 卢一：《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 2020 年博士学位论文。

〔2〕 陈丽华：《故宫博物院新入藏的湖北出土战国、西汉漆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 6 期。

〔3〕 [美] Colin Mackenzie，张毅编译：《战国时期纺织品对青铜器、漆器、陶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上海文博论丛》2002 年第 1 期；周世荣：《湖南的战国漆器》，《楚文化研究论集》（一），荆楚书社 1987 年版，第 169—185 页。

〔4〕 后德俊：《“泆”及“泆工”初论》，《文物》1993 年第 12 期；陈振裕：《泆与“泆工”探析》，氏著：《楚文化与楚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0—525 页；周世荣：《汉代漆器铭文“泆工”考》，《考古》2004 年第 1 期。

〔5〕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1—183 页；任攀：《〈东汉元和二年“蜀郡西工造”鎏金银铜舟〉补正——兼说“泆”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33—642 页。

墓葬或同一墓地中出土漆器铭文内容的分析,^[1] 而对战国秦汉时期漆器铭文内容的综合分类分析,则以《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为代表,书中对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秦汉以来漆器的铭文内容进行了整体分类,将其分为与生产机构、时间、地点、制作工艺等有关的制作标记,以及体现漆器使用者姓名、等级、漆器具体用途等信息的物主标记两类。^[2]

7. 漆器生产、管理的研究

战国秦汉漆器上表明生产地点、生产机构的铭文,为学者讨论漆器生产、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绝佳的物证材料。1975年,俞伟超、李家浩发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一文,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的烙印铭文研究为基础,判断墓中许多漆器应为成都市府作坊的产品,并讨论了成都官营漆器生产机构从市府到工官的变化。^[3] 与此同时,蒋英炬发表《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一文,根据山东临沂银雀山 M4 出土漆器上的铭文,讨论了漆器的产地、生产机构、所有者等问题。^[4] 这些利用漆器铭文判断漆器产地,并对漆器手工业生产、管理等问题展开讨论的早期探索,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1980年代,宋治民、陈振裕等学者,从传世文献、考古出土材料等方面,对战国时期及汉代漆器手工业分别进行了总结,讨论漆器手工业体系及生产技术与工艺等问题。^[5]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漆器手工业生产、管理等问题更加关注。如洪石根据蜀郡、广汉郡工官及考工、供工生产的漆器上的铭文,详细讨论了这些机构的生产工序、管理体系等,并初步涉及了对官营、私营不同漆器生产体系的讨论。^[6] 郭永秉在重新辨认释读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铭文的基础上,结合湖南长沙王陵出土有铭漆器,对湖南及四川成都地区漆器生产机构和产品特点再次进行

[1] 何旭红:《对望城县凤篷岭汉墓发现铭文的初步认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59—467页;聂菲:《海昏侯墓漆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探讨》,《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2]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59页。

[3] 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考古》1975年第6期。

[4] 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1975年第6期。

[5] 宋治民:《汉代的漆器制造手工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陈振裕:《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漆器手工业》,《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6]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212页。

了讨论。^[1] 朱学文则总结了秦漆器生产的性质、生产工序、管理和质量监督等。^[2]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国外学者亦开始关注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生产、管理的研究，美国学者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从有铭漆器出发，讨论了汉代蜀郡、广汉郡工官的漆器生产中的“大规模生产”现象，以及工官作坊生产漆器产品的器形、纹样特点。^[3]

8. 漆器使用等级的研究

有关漆器使用等级的研究，目前并不丰富，学者主要关注战国秦汉时期，不同等级墓葬出土漆器在漆器类型、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陈振裕在《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中，将战国时期、秦和西汉时期的墓葬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分别总结各等级墓葬中出土漆器种类、纹样及数量特征。^[4] 卢一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使用等级特征的历时性考察，认为与战国时期相比，除最高等级与最低等级人群外，中间阶层人群在漆器使用的数量和质量上差异并不显著，表明秦汉时期漆器使用的普遍性进一步扩大，来自等级的限制已非常弱化，漆器的使用更多与地域风尚、个人喜好及经济实力有关。^[5]

9. 综合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傅举有为《中国漆器全集 3·汉代》卷撰写了有关汉代漆器的综论文章，文中较详细地总结了汉代漆器的器型特征、纹样题材、制作工艺，并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讨论了漆器生产地域、生产机构及其产品特点以及汉代漆器的生产工序问题。^[6] 进入 21 世纪以来，有多位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选择以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讨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洪石、卢一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洪石在《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中，除对战国秦汉漆器进行分期外，

[1] 郭永乘：《谈马王堆汉墓漆器等有关漆器质地的文字信息及相关问题》，氏著《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0—331 页。

[2] 朱学文：《秦漆器手工业研究》，《文博》2012 年第 1 期。

[3] Anthony J. Barbieri-Low, *The Organization of Imperial Workshop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1; Anthony J.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4] 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

[5] 卢一：《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 2020 年博士学位论文。

[6]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美术综论》，《中国漆器全集 3·汉代》，福建美术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6 页。

总结了漆器的制作工艺、铭文内容，并且重点讨论了漆器的生产、使用与流通问题。卢一在《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研究》中，除对漆器器型、纹样进行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外，讨论长时段内礼制社会产生与消亡、秦汉统一帝国形成等社会变革，在纹样类型与风格、社会功能及使用与流通方式等方面对漆器产生的影响。^{〔1〕}此外，朱学文则对秦漆器的类型、纹样题材、制作工艺、铭文内容等进行了综合讨论，还兼及了秦漆器与同时期巴蜀漆器、楚漆器的比较研究等。^{〔2〕}

纵观学术史，自 20 世纪 20、30 年代起，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发现与研究，一直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史不断推进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有关先秦两汉漆器的基础研究（如分期年代、纹样演变、制作工艺等）已趋于成熟，而利用考古出土材料，结合自然科学分析手段，从手工业考古等角度对漆器进行综合分析，并将漆器置于社会大背景中综合考察，已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取向。漆器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扩展，体现出中国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发展。

（卢一，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事记

（考古发现一栏仅列举较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漆器发现，研究与探索仅列出最初研究、部分代表性研究及综合研究）

时间	发现与著录	研究
193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侯家庄 M1001 中发现豆等商代漆木器	
1955		商承祚《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出版
1957	《长沙发掘报告》出版，其中发表了部分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材料	陈直发表《两汉纺织漆器手工业》；徐则林发表《试谈长沙出土战国漆器工艺图案》
1957—1958	河南信阳楚墓中出土大量战国漆器	
1965—1966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中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战国中期漆器	
1972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西汉早期漆器	

〔1〕 卢一：《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 2020 年博士学位论文。

〔2〕 朱学文：《秦漆器研究》，三秦出版社 2016 年版。

续表

时间	发现与著录	研究
1973	山东临沂银雀山 M4 中出土保存较好的西汉早期漆器	
1973—1974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出土保存较好的商代漆器残片；湖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中出土保存完好的西汉早期漆器	
1975	湖北江陵凤凰山 M167、M168 中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西汉早期漆器	俞伟超、李家浩发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蒋英炬发表《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
1975—1978	湖北云梦睡虎地墓地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战国晚期至汉代漆器	
1978—1980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数量较多的漆木器	
1980		陈振裕发表《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
1981—1983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保存较好的西周漆觚、鬲等	
1982	湖北江陵马山 M1 中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战国晚期漆器	
1984		殷玮璋发表《记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漆器》
1986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反山墓地发掘，部分墓葬中出土漆器	高炜发表《陶寺龙山文化木器的初步研究——兼论北方漆器起源问题》
1987		王巍发表《关于西周漆器的几个问题》
1988	湖北当阳赵巷春秋时期墓葬中出土漆方壶、豆、簋、俎等	
1992	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地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西汉早中期漆器	
1995	湖南永州鸽子岭 M2 中出土较多保存完好的西汉晚期漆器	
1997		傅举有发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美术综论》
2001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目前年代最早的髹漆器物——弓	李安敦 (Anthony J. Barbieri-Low) 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i>The Organization of Imperial Workshops during the Han Dynasty</i>
2006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出版
2007		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出版
2008		金普军完成博士论文《汉代髹漆工艺研究》

续表

时间	发现与著录	研究
2009—2012	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及其陪葬墓中出土保存较好的西汉早中期漆器	
2013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 M28 中出土漆觚、豆、禁、杯等	聂菲《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出版
2016	《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出版	
2019		《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整理与研究》出版